

和平心理学的经典传统与现代研究趋向

刘邦春¹, 田 营^{2,3}, 万振东^{4*}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基础部, 北京 101416; 2.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长沙 410081;
3. 枣庄学院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枣庄 277100; 4.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芜湖 241000)

摘 要: 本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和平心理的看法, 以“和平”为主线, 追溯和平心理学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奥古斯丁、夸美纽斯、康德等从本体论视角, 确立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重视研究原始人、战争英雄等的和平心理品质, 早期的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类和平意识研究, 机能心理学强调通过建设学校“微型共同体”, 提高儿童的和平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则为战争与和平心理提供了新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和平潜能、致力于世界和平冲突化解, 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的兴起。20 世纪末的和平心理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 发生了“政治道歉”、和平冲突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趋向。

关键词: 和平; 和平心理; 和平冲突化解; 和平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1)04-0302-07

心理学自成为一门科学以来, 一直将改善人类福祉、追求幸福和平视为自身研究使命, 但是“和平”在心理学发展史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20 世纪末, 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强大的和平心理学研究思潮, 呼吁恢复和平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 重视和平心理的研究价值, 为人类的和平未来而奋斗(刘邦春, 万振东, 2020)。

1 和平心理学的本体论基础

1.1 “爱”与“恨”的争斗: 古希腊和平心理学哲学思想

现代心理学思想往往同古希腊人智慧上的成就具有内在的同源性, 和平心理学哲学思想亦是如此。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72 BC-497 BC)认为, “和平”意味着宇宙与生命的和谐共存, 和平、和谐、友谊被视为衡量个体行为发展的最高准则。战争是人类占有欲的产物, 人们要摆脱“人类具有侵略本性”的错误观点, 尽快“对自己的敌人表示友好”。毕达哥拉斯的和平观点得到了统治阶级和贫民的认同, 有利于当时国际和平关系的发展(Vogel, 1966)。

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493 BC-432 BC)认为, 外部的“爱”与“憎”构成了万物运动和变化的根本动力和根源。“爱”的原意是“友好”, 意味着“善良”、“好的”, 能促使各种元素的结

合, 成为万物形成之始; “憎”地原意是“争吵”, 意味着“邪恶”、“坏的”, 能促使各种元素的分离, 成为万物分解之源。恩培多克勒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受到黑格尔的称赞, 认为没有分离的联合与没有联合的分离是不存在的(车文博, 2018)。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 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 一是近乎邪恶的天性, 二是面对邪恶的天性进行不懈抗争的善良人性。由于人类贪婪或者追求穷奢极欲的物质财富引起的不义战争, 必须进行谴责。社会和政治团体需要和平共处, 但他们因生活和行动的基本需要, 不得不进行经济扩张。和平是两次战争之间的过渡时期和现存的状态, 只有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社会秩序才能建构和谐城邦。由此看来, 柏拉图既恪守和平共处理念, 又制定了正义战争的标准, 因此他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哲学分析, 是从社会学、政治学、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等角度审视战争与和平,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对于探讨世界战争与和平发展历史、对于探讨世界军事思想史具有启发意义(迪·斯摩科维蒂斯, 潘嘉珍, 1991)。

1.2 神性的和平追求: 中世纪和平心理学哲学思想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认为, 完美的和平在尘世中是难以实现的, 是超历史的目标。和平是一种特定的秩序, 由多个不同的、甚至是敌对元素组成的多元性整体, 并存在于一种未受干扰的宁静之中。人

* 通讯作者: 万振东, E-mail: guwanren99@163.com。

类与身体,心灵和灵魂息息相关。和平总是“与……的和平”。只有当超越性处于和谐的关系中时,和平才能在社会、政治的土壤里成长。和平意味着国家、家庭和个人被赋予了争取正义的使命。上帝创造的“天国之城”,能够实现人类肉体、思维和灵魂三者的和谐,按照神的意愿实现精神上的完美和平。但由于人犯了原罪而堕落在“世俗之城”,人类造成自身价值的崩溃,误将具有相对性的、隐藏着暴力和冲突在内的局部和平视为完美的和平,只能依靠武装强制的军事力量实现相对的和平(奥古斯丁,2006)。“地上的和平”只有在历史走向终结的世界末日才能实现,所以完美的和平靠人类活动无法实现,只是末世希望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古斯丁完全把“和平之路”从“和平目标”中分离出来,并认为从世俗和平到完美和平的转变并不是渐进的。和平与神性有关,处于垂直向上的维度,而历史则是按照水平方向前进的。奥古斯丁将完美的和平信念投向父权式的上帝,对现实社会的和平持有悲观态度。

捷克哲学家、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的和平观以纯粹的尘世主义为背景,既保留了奥古斯丁的断言,又播下了现代自主与自由意识,并在康德那里成熟起来。“神”作为“至高无上的善”,具有最高程度的可沟通性,拯救已经堕落的人类。神以“教学”的方式来减少人类的迷乱,唤起和提升人的自主性。感官经验、人类思维和《圣经》的启示被夸美纽斯称为具有创造性共同表征的“光之源”。夸美纽斯主张“泛智”教育观点,所有人都接受教育,得到广泛全面的知识,发展充分全面的智慧,人们在相互激励、相互敦促的过程中,逐渐消除混乱、摆脱贫困,减少污秽,实现社会安定,完成民族独立,维持和世界和平。他在晚年期间,撰写了《关于改进人类事物的总建议》一书,主张通过政治、宗教、教育等综合和平建设方案,建构“光明委员会”、“世界元老院”、“智慧之光大学”等机构,全面改善人类社会事务。夸美纽斯的和平世界追求不再仅停留在理想层面,而是提出了实实在在的蓝图规划,主张通过教育实现人类福祉,其和平教育思想对促进世界和平具有积极贡献意义(张桂春,姜元涛,2012)。

1.3 现实社会的和平追求:十九世纪和平心理学哲学思想

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主流哲学家干脆放弃了永久和平的哲学理想。哲学家卢梭、霍布

斯等自然法家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类最初的原始状态是和平的,但摆脱了原始状态之后,人类进入道德沦丧的战争状态,人类堕落得比原始状态还要糟糕。霍布斯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和平激情,始于对死亡的畏惧。只有建立以暴制暴的“利维坦”这个无可匹敌的国家权力机器,利用威慑的力量,使人们心生恐惧,才能征服大家的意志,建立社会契约,维持社会秩序,实现人类理性的升华(杜明明,2016)。

康德认为,战争不是单纯的罪恶与暴力手段,而是大自然为实现合目的性法则建立的“天意”工具,激发人类理性和道德意识的觉醒,强制人们走向永久和平。永久和平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实现“国家权力-国际权力-世界公民权力”的法律体制,二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

在此,可以看出康德与卢梭、霍布斯和平哲学的不同之处。卢梭和霍布斯以人类的现实社会作为起点,沿着人类社会发时间轴迹逆向至原点,完成了描绘人类发展历程的前一半,而康德则是顺着时间轴出发,探索人类终极的和平幸福未来,将描绘人类发展历程的后一半补充完整,最终实现哲学家们追求永久和平的“甜蜜梦想”。

2 和平心理学的认识论基础

2.1 从和平品质到战争“道德等价物”的和平心理学思想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心理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专门研究“心”的独立科学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冯特还用了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民族心理学》巨著,以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心理发展的历史,实现心理学体系的自身的历史命运的探讨(高申春,2002)。在对原始人的考察中,冯特认可原始人内部成员之间的坦率、真诚和纯真,批判原始人在民族相争时表现出的欺骗和恶意。冯特认为英雄时代的语言艺术真实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特征,歌颂了人类英雄在战斗行动中勇敢、忠诚、爱国等品质,赋予人类具有“人类”和“人类本性”双重含义,使人性逐渐向全人类扩展的价值属性,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研究的发展。

美国和平心理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以生物本能论为基础,提出了“战争魅力论”的观点。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类心理需要,比如群体认同感、摆脱平庸生活在部队获得战斗目标、战争爆发时消除个体不确定的焦虑感、获得一致抗敌的凝聚力

等等。詹姆士追溯战争发生的心理根源,目的是为了思考人类怎样摆脱战争。他认为,国家要提供和平组织力量,比如在青年中,招募一支为着和平奋斗的军队,遵守军队钢铁般的组织纪律,体验兄弟般的友情,体会到强大的团体凝聚力,以免在和平时丧失男子气概,这被他称为“战争道德等价物”,为此,詹姆士赢得了美国“首位和平心理学家”的美誉。

2.2 从“微型共同体”到“和平心理调节能力”的和平心理学思想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民本主义教育思想,彰显了功能主义的和平心理研究价值。为了积极回应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面临的社会变化与科学进步,杜威提出了“学校即共同体”(the school as a community)的和平心理学思想。共同体之于个体,恰似水之于鱼,学会成人,就要通过沟通互惠过程,相互理解,建立共同体信仰,将个体力量转化为人类才智和价值。学校是一个“微型共同体”,目的是教育儿童“成人”,为此,要尊重孩子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教育儿童学会具有共享的人生目标和信念,也要教授他们科学知识,还要引导他们学会沟通与协调,化解冲突,在参与到共同体生活过程中,得到人共享的善。从这个角度说,教育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功能和尺度(程亮,2016)。由此看出,杜威的教育思想倡导儿童形成超越国家、放眼于全球,致力于世界性的“人类协作事业”,具有世界主义的和平心理学特征。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提出了控制式的和平心理学观点。斯金纳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要用实验分析的方法分析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他将人类意识和心理归因于身体的身体状态。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设计,建立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和平的文化与社会。斯金纳深受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认为好的物种就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物种,好的社会就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社会。为了防止暴行,使人类在更美好的世界上生活,斯金纳主张所有人一出生就通过积极强化进行严格的训练,培育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在斯金纳发表的小说《沃登第二》里面,他饱含深情地描述了心中理想的、和平的“桃花源”生活。这个行为主义理论下建立的“乌托邦”,所有人受到严格控制和管理,人人都遵纪守法,因此没有犯罪,也就没有监狱。为了防止失态、易怒引起的社会不安,不准开设酒吧,

也不支持任何吸毒行为。人人有工作,不用考虑失业后的困顿,不会有精神病院,犯罪也不可能出现。《沃登第二》出版后,在美国纽黑文、加拿大等地建立了类似于沃登第二的社区团体,致力于更美好社区建设。斯金纳主张混淆了控制和影响的概念,他主张的控制是将当事人主体性置之度外,但影响应该建立在当事人主动选择的基础上。他主张通过强化来设计社区成员行为时,人的自由和尊严荡然无存,有可能导致极权社会的出现。因此,这种贬低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乌托邦”,使人失去了本有的理性的“高贵”而饱受质疑。

新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1942)在二战期间,决心从小白鼠与黑猩猩的行为心理学入手,融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把和平当作人类最核心的问题,为人类的和平未来寻找一丝希望的曙光。托尔曼主张从分析人类挫折、侵略与独裁者性格的认知结构出发,分析战争宣传中的狭窄种族主义成分,分析人类攻击性的生物学根源与社会动机。他认为战争是“个体自卑感与因遭受父母、上司压制对外群体的心理宣泄的投射的结合体(Rudmin,1991)”。托尔曼(1942)认为,心理学需要把人类化成“具有和平心理调解能力”(psychologically adjusted man)、能够实现和平的人。实现和平社会需要实现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建立一个使人们免受多种挫折感的经济秩序;第二,建立新的教育与社会体制,使人们认同父母或其他领导的权威;第三,建立一个世界超级组织,个体能够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更忠诚于自己的星球成员身份。为此,托尔曼主张在全球设置统一的和平教育课程、统一的世界国旗、国歌、货币和邮票,以此教育各个国家的公民克服狭隘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观念,建立世界公民认同感。设置一个世界和平组织,下设秘书处、立法、法院与行政部门,旨在消除世界战争,公平分配世界财富,维护世界和平(Tolman, 1943)。托尔曼的和平观点尽管有些简单,在实践中收效甚微,但在随后的几年,托尔曼一直为维护世界和平奔走,成为 1945 年《人类本质与和平宣言》(Human Nature and the Peace)的发起者。

2.3 从精神分析到和平人性的和平心理学思想

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建立在“生本能”与“死本能”这两种相互结合又相互排斥力量的基础之上。一方面,人体内部具有促进生长和发展、抗击死亡的能力,就是爱和建设的能量,

就是“生本能”；另一方面，人体内部也具破坏性、憎恨的力量，即“死本能”。战争是人的毁灭性释放的方式，体现的是人的死本能对外做出的破坏。弗洛伊德自己目睹了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伤亡，他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战争，他深感恐惧，在与爱因斯坦的通信中，表达了对人类和平未来持有悲观失望态度，对此我们要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但弗洛伊德打破了传统的理性思维，肯定了非理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为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了新研究视角（车文博，2018）。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和平未来心怀希望与乐观。他们认为，人性向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人性能表现出良善和平的一面。马斯洛主张把健康和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剖析人类和平动机与潜能，人类具有战争仇恨、避免战争的能力（刘邦春，2010）。为了实现优美心灵的“尤赛琴”（Eupschian）社会，要在教育中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学会利他式的存在爱，学会彼此尊重，彼此关爱（彭运石，1999）。罗杰斯（Carl Ranson. Rogers）认为，人类的自救之道在于用“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接近法，用移情的心理化解群际纠纷，消除人际仇恨、避免核武器战争。他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技术在周旋于种族世仇、促进国际和平等不同层次的和平活动中，甚至在戴维营和平谈判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李绍崑，2007）。后来，他的学生夏皮诺与罗杰·费舍尔在哈

佛大学举办的谈判心理培训班，充分运用“以人为中心的”调解技术，重视心理情感的作用，成功解决了厄瓜多尔－秘鲁两国间长达 50 年的边界争议（罗杰斯·费舍尔，丹尼尔·夏皮诺，2008），提高了和平心理模式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和声誉。

3 和平心理学现代研究趋向

20 世纪末以来，和平心理学研究的重心不再是探究暴力产生的心理根源，而是注重地缘语境下的和平心理恢复研究，更加注重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群际冲突，探索和平社会建构方案，呈现出积极和平心理学研究取向。

3.1 自上而下：“政治道歉”研究趋向

道歉是对感到自责的事情承认错误的行为。政治道歉是指国家政府或者大型机构从官方层面因为对国民成员或者另一个国家过去发生的侵略、战争或者种族冲突等不公正、伤害等，做出的道歉行为。政治道歉必须由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领、国家高级官员等人来做，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政治道歉主要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公开、客观承认国家或政府对受害者犯下的罪行，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为自身行为感到后悔，保证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事情。政治道歉发生的前提和保证是：施害者必须自愿消解过去作为施害者的身份和利益。政治道歉有利于引导国家种族紧张关系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其心理机制作用如下图 1 所示（朱陆民，刘燕，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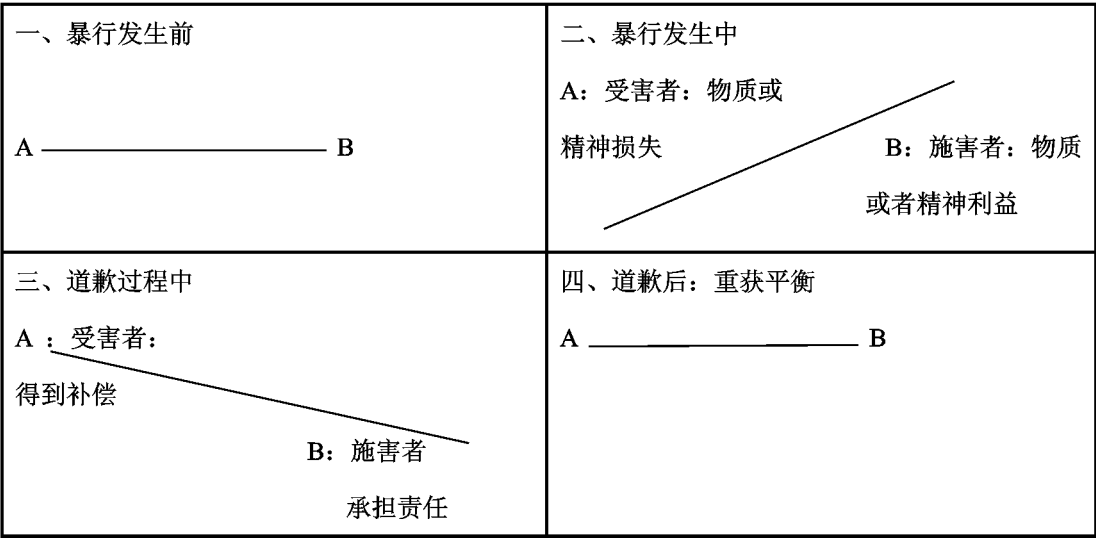


图 1 政治道歉作用心理机理示意图

二战后 60 多年来，德国政府通过多次“政治道歉”行动，进行二战中德国纳粹所犯的滔天罪行深刻历史赎罪，进行了真正触及灵魂的反思，德国顺利

重返国际舞台（刘邦春，2015）。1970 年，德国波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自发下跪道歉，公开承认德国的历史罪过，成功缓和了紧张的欧洲

局势。此后联邦德国数任总理如赫利、科尔、约翰内斯·劳等通过多种方式对纳粹德国二战期间所犯的罪行诚恳道歉,发表著名的赎罪书,彻底解决二战中受害国及其人民遗留的各种赔偿问题,并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道歉,成立“赎罪委员会”,教育德国年轻一代永远记住德国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吸取教训。

21 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成功运用了“政治道歉”的和平心理模式,促进了种族和解,推动了社会和平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建立之后,1901 年到 1960 年,一直实行“白人至上”的“白澳政策”,暴露了欧洲殖民者打着文明旗号从政治、经济、文化对土著居民再殖民的野心,消解了土著居民的自我认同。2008 年 2 月,陆克文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向土族居民实施“白澳政策”进行政治道歉,让饱受心灵痛苦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得到精神抚慰,促进了种族和解,揭开了澳大利亚和平社会建设的新篇章(刘邦春,2016)。

3.2 积极接触:和平冲突化解研究趋向

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和平心理学认为,人类具有创造性、建设性地和平化解冲突的能力。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1967)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友好的,人具有开展和善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的愿望。之所以存在群体冲突,是由于不同民族和种族间缺乏足够的了解信息,或者存在错误信息,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这种信息缺乏或者信息错误被称为过失无知现象(faulty ignorance)。积极群际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主张为群体冲突双方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让他们在新情景下获得更多信息,澄清过去错误认知,减少群体间的敌意和对抗,为双方提供建立良好群际关系的习得机会(Ben & Amir,1988)。积极的群际接触能够促使成员发生四个心理认知变化:第一,获得认识外群成员的机会;第二,新情景下产生新期盼;第三,友好行为有利于减少群体焦虑,和平行为体验促进同情、信任、理解态度增加,同情和赞赏增多(Pettigrew,1997);第四,群际接触增多,人们会发现外群成员更多可取、可欣赏之处,会更包容、更认同外群成员。

Crisp 和 Turner(2019)提出的想象接触模型(imagined intergroup contact),为促进无法实现直接接触行为的地区的群体关系提供了可能。想象接触是个体在模拟情形下在想象中对外群成员实现的接触

的行为。Crisp 和 Turner 认为,如果结怨已久的群体双方在想象的情境中进行多次积极接触,将会降低双方的偏见与歧视,为实现将来的真实接触与和解奠定基础。他们邀请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大学生作为被试,让他们根据实验人员描述的情景,在想象中完成与希腊人的接触行为,并报告他们想象接触过程种产生的感受。研究结果表明:想象中的特定社会背景,与真实的社会背景有着某些相似的积极功能,能唤起个体产生类似的认知体验,做出类似的行为。由此看来,在实际接触难以实施的地区,想象接触有利于使个体减缓对外群成员的焦虑程度,减少刻板印象与消极态度,并且容易产生对外群成员积极倾向(Stathi & Crisp,2008)。

3.3 自由人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趋向

和平心理学认为,实现世界和平,要树立公正宽容的价值观,消除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心理壁垒,在本质上是把本是陌生人的“他们”(them)转变为相互关爱的“我们”(us),形成充满爱意的“人类心理共同体”。苏格兰哲学家约翰·麦克穆雷(John Macmurray,1961)认为,关系是构成人的本质。人类从出生,因为完全依赖他人才能存活下来,这种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引导个体逐渐走向成熟。信任、关心和友爱的行为构成个体生活繁茂的前提。而恐惧、仇恨与怀疑则使个体走向毁灭。个体的面临的困境、面临为难的选择和冒险失败的消极因素表明了人类问题存在的问题性。这种选择人性论要求人们有勇气,有胸怀,坦率真诚地向别人完全揭示自己,通过建立真正的朋友关系,才能构成有意义的生活,才能形成有组织的“人类联合的整个结构”。由此看来,麦克穆雷认可人类社会交往的普遍性,提倡建立相互依赖的积极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受麦克穆雷心理学哲学思想的启发,美国和平心理学家 Joseph de Rivera(2018)倡导人“爱与恨”的争斗中,选择形成相互关爱占主导的关系,把整个星球变成“关爱型共同体”(caring community),人类有希望走向和平未来。

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共同体”是贯穿马克思一生思考的核心主题和“理论内核”,以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点,跨越了民族、国家、文明等差异,强调人类整体性,倡导“共在性”与“一致性”,共有、共享、共建、共存程度高,是和平美好的、最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式,它把人类共同利益和解放诉求融合起来(刘伟,2018),既对作为个人的人

投以关注,也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投以关注,体现了非凡的哲学理论勇气与人类终极和平价值,彰显了马克思是唯物主义最高价值诉求(廖凡,2018),绽放出前瞻性的智慧光芒。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旨在追求人类共通福祉,反映人类共同需要,具有积极的和平心理学意义(刘邦春,2020)。“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人类自身解放、获得人全面自由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共同体形式,凝聚了中国东方大国的和平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贡献的未来和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体现的是关于马克思哲学深层重要问题意识,体现了人类对和平终极价值的追求与关怀(贺来,2016)。首先,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已经进入命运共同体”观点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它意味着全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乃是追求光明美好的未来。为了避免未来各种风险,迎接不可知的挑战,人类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攻坚克难,共渡难关。人类需要意识到,如果人类不能休戚与共,或许面临悲惨凄凉的命运;第二,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表明人类命运事实上紧密关联,不能分开。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实践性,具有可以付诸于行动的性质(舒远招,2017)。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和平心理学意义:第一,它涵盖全人类,是最大的和平共同体;第二,它体现的是对全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类尊严和生命价值的追问,这与和平心理学的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第三,它并不主张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关注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不具备排他性,因此是全人类最长远、最根本利益的联盟,以追求人类和平幸福解放为目的共同体,这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兼具人类学与伦理道德哲学性质和国际政治关系基础理念性质的概念,体现了人类对于自己命运认识和掌握的新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解答了我们在未来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构这样一个世界”这个根本问题,主张人类和平共处,开放包容,命运休戚相关,主张放弃零和思维,消除冷战思维和丛林法则,主张将人类自我定位与民族命运和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关联,表明了人类的和平价值取向、和平诉求、和平价值认同与和平心理期待(刘邦春,2020)。

参考文献

- 奥古斯丁著.(2006).《上帝之城》(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车文博,郭本禹.(2018).《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程亮.(2016).学校即共同体—重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3(15),14-21.
- 迪.斯摩科维蒂斯,潘嘉珍.(1991).柏拉图的战争与和平思想.《军事历史》,16(2),49.
- 杜明明.(2016).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南方论刊》,6(22),17-20.
- 高申春.(2002).冯特心理学遗产的历史重估.《心理学探新》,22(1),3-7.
- 贺来.(2016).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8),3-9,128.
- 李绍崑.(2007).《美国的心理学界》.北京:商务印书馆.
- 廖凡.(2018).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建构.《中国法学》,5,41-60.
- 刘邦春,万振东.(2020).和平心理学的三种理论模型.《心理学探新》,40(2),132-137.
- 刘邦春.(2020).“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心理学解读.《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67(3),73-78.
- 刘邦春.(2015).“中国梦”的和平心理张力:世界视阈下的和平心理模式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
- 刘邦春.(2010).“和平餐桌”心理学:马斯洛的和平心理关切.《心理科学进展》,18(7),1193-1198.
- 刘邦春,叶浩生.(2016).从“白澳政策”到政治道歉—论澳大利亚社会和平心理模式重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6),54-58.
- 罗杰斯.费舍尔,丹尼尔.(2008).《理性之外的谈判》(夏皮诺著,闫佳,邵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刘伟.(2018).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学习时报》,2018年1月3日第2版.
- 彭运石.(1999).《走向生命的巅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舒远招.(2017).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及其对构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0-15.
- 张桂春,姜元涛.(2012).探究“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的生成.《辽宁教育》,12(23),25-27.
- 朱陆民,刘燕.(2015).试论政治道歉对中日关系的良性建构.《太平洋学报》,23(12),33-44.
- Allport, G. W. (1967). Allport. In E. G. Boring & G. Lindzey (Eds.),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pp. 1-25).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Ben, A. R., & Amir, Y. (1988). Intergroup contact,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change in ethnic attitude. In A. W. Wstroebe, D. Kruglanski, & M. Hewstone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 of intergroup conflict(pp. 151 – 165). Berlin; Springer.
- Crisp, R. J. , & Turner, R. N. (2009). Can imagined interactions produce positive percep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231 – 240.
- Joseph deRivera. (2018). Themes for celebration.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4(4), 216 – 224.
- Macmurray, J. (1961). *Persons in rel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 Pettigrew, T. , Christ, O. , Wagner, U. , & Stellmacher, J. (2007).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on prejudice; A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1, 411 – 425.
- Rudmin, F. (1991). Seventeen early peace psychologists.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31(2), 12 – 43.
- Stathi, S. , & Crisp, R. J. (2008). Imagining contact promotes projection to out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6), 943 – 957.
- Senel, H. , & Richard, J. C. (2010). Imagined intergroup contact: A new technique for encouraging greater inter – ethnic contact in cypru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6(3), 97 – 108.
- Tolman, E. C. (1942). *Drives toward war*. New York; Appleton – Century.
- Tolman, E. C. (1943).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ost – war world.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141 – 148.
- Vogel, C. J. de. (1966). *Pythagoras and early Pythagorean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neglected evidence on the philosopher pythagoras*(pp. 81 – 138). Assen, Netherlands; Van Gorcum.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Research Trends of Peace Psychology

Liu Bangchun¹, Tian Ying^{2,3}, Wan Zhendong⁴

(1. Fundamental Department, Spa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PLA, Beijing 101416;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3.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Science,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00;

4.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ate back the history logic of peace psychology by discussing psychologist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follows the peace as its research line. Philosophers Pythagoras, Empedocles, Plato, St. Augustine, Jan. Amos Comenius, and Kant proposed peace ideas on the ontology perspective. Wundt's folk psychology stressed the study of primitive men and war heroes in order to find the peac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psychologists' peace proposals called for the micro – community at school level. Psychoanalysis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war and peace. Humanistic psychology accented the peace potential of human beings and concentrated o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peaceful ways. Therefore, they promoted the rising of peace psychology. The peace psychology in the end of 20 century proposed peace in peace ways in three positive research trends: political apology trend, conflict resolution trend and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trend.

Key words: peace; peace psychology; peace conflict resolutio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